

用，并阴毒地说：“如果天皇一旦有令，我们马上就可以将这种细菌撒在美国，来年将寸草不生”。

正是在石井四郎的宣传鼓动下，山西日军在垂死前多次向我人民使用细菌武器，造成严重损失。如战犯×××供称：“1943年10月至1945年8月，我在太原市西洋市北支派遣军直属部队防疫给水部工作。在河南作战时，日军在新乡一带以救济为名把伤寒菌掺入白面，杀害了很多中国人民。”又据种村文三供认：“1944年4月，在潞安陆军病院任卫生准尉时，我在潞安西南约6公里的某村北边井内投过伤寒菌。经过15天后，听说得伤寒的老百姓有30名，其中3名死亡。”战犯五十岚猛供述：“1945年7月上旬，我在山西曲沃县城外驻扎时（第114师团直辖炮兵大队本部）……把从临汾县城部队司令部情报室领来的高热剂和下痢的毒品，扔到东头井里和村中的水井里。”

1944年夏，日本侵略者日薄西山，石井奉命离开山西回日本，筹组细菌战总部，这才结束其在山西的罪恶活动。

## 毒辣阴险的“御用挂”吉冈安直<sup>①</sup>

袁新觉罗·涛杰

### 一、他与溥仪的关系

他是在“九·一八”的前四五年，就在日寇驻我国天津的军队里任中下级的军官，从那个时候起，就与溥仪相识。在他由天津回国以后，便在日本鹿儿岛的联队里任大队长。1930—

<sup>①</sup> 这是涛杰1954年对吉冈安直的揭发材料，标题为编者所加。

1931年间，我在日本学习院高等科念书的时候，他曾经由鹿儿岛给我来信，约我在暑假归国时，务必到他的家中去盘桓几天。于是我就在归国的途中，特意到他家住了约六七天。在那个时候，他曾经领我到他的家里去参观，并在联队的将校团里会餐，他还吹嘘他与溥仪的交情。在他的家中，时常地以“弦外余音”的语气，骂蒋介石及其他的军阀，并请我转告溥仪：“时局如此，请他诸事保重。”那个时候的我，乃是一个极端抱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人，认为他真是一个好人。从此并时常地保持着通信的关系。

我在日本士官学校本科当学生时，偏偏“冤家路窄”，他也被调到士官学校充战史教官，于是时常地约我在星期日到他家吃饭。不久，他被派赴满洲，临行之前，他又约我到他家，秘密向我说：“我这次调满的任务，据说是在令兄的身边作事，我求你先给令兄写一封信，请他给我准备一个白天办公的地方，因为我不愿意和其他的人成天在一起混。”——在事后，我才明白他的用意：就是为了让当时的关东军部及伪满的职员们都要知道他与溥仪的关系而已。——他并对我说：“我这次到满洲，我得先要求兼着关东军的参谋，否则什么事也办不好。”当时的我，还傻子似的不住地点着头赞同他的意见呢，哪里知道这就是他在伪满许多年为非作歹的主要基础呢？！

## 二、他的任务

简单一句话，他的任务就是：“指导和支配着伪帝溥仪，以便逐步地实现日寇的‘步步加紧’的残害我国人民的罪恶计划”的。

他是关东军的参谋兼着伪官中的“御用挂”——就是替溥仪办事的人之意——的职务的。

### 三、他的阴谋及罪行

他是一个表面上在伪满的政治舞台上不很出头露面，可是在实际上操纵着傀儡戏的总线索的唯一的主要的角色。他可以利用溥仪去作带头的作用，并可以封住一般伪满官吏的一切反对的嘴，例如“‘皇帝陛下’尚且如此……”一类的话，便是他最常用的得意的武器之一。

#### 甲、两面要挟，就是他的“固位之道”

对于自溥仪以下的人，便拿关东军部的铁帽子来硬扣；对于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则以他是“溥仪的唯一的亲信者”来自行抬高他自己的身价，例如时常地对人自我吹嘘道：“他——指我而言——是‘皇帝’的手足；我——指我自己——就如同是‘皇帝’的脚踏头。”也有时向人说：“他——指溥仪——就如同是我的孩子一个样。”至于对溥仪及其他的中国人呢？便时常地说：“这是军的意旨”，或说：“这是关东军参谋会议决定了的”等等相胁迫。又如把自己画的画，求郑孝胥给题正字，然后再求溥仪给题正字，最后是他把这幅画，献给裕仁的母亲。像这样自己替自己制造空气的卑鄙手段，是屡出不穷的，是十余年如一日的。

#### 乙、小恩小惠的作风

对于溥仪以下——连我也在内——总是拿献些小殷勤来邀买人心的。例如，对于北京我父亲的米面特别配给，溥仪给我父亲寄钱时的帮忙，对于我的结婚问题，对于我们的入日本军事学校的肄业等等，真是一时也说不尽。总而言之，他是想以小小的好处，来作钓饵罢了。一切毒害人民的诡计阴谋都是从这些小信小义上萌芽出来的。

#### 丙、民族的高间

对于这种帝国主义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法，他也是使用的烂熟的。对于深有狭隘的民族感情的溥仪及我，是不遗余力进行的。例如，骂辛亥革命后的国民党的政策及军阀的内战及苛政等，随时都在刺激着我们的“满族和汉族”的历史上的创伤。又如制造“满族人可靠，汉族人是靠不住的”、“唯有‘满洲皇帝’才是真正理解‘一德一心’真谛的唯一一个人”等等荒谬可耻的怪论。还时常有意无意中露出“汉人是不能容满洲人的，现在唯有日本才是真正同情满族和实际扶助满族的一个有力者”的带有挑拨性的言辞，这些都是他日常爱用的熟套手段。

#### 丁、“一德一心”的里面

把“日满的不可分”挂在嘴上，把人工特制的亲善，处处搬到人的面前来。例如，要提倡东北人民必须捐纳金属，来增加日寇的侵华物力时，便先示意溥仪拿出金属等物，以示带头的意思；为了使一般人都要挨冻受饿的搏节出煤炭等物以便满足日寇的搜刮贪欲时，便讽示溥仪先作低温的耐寒生活；为了装饰“日满的一体不可分”，替我找日本女子结婚，作成种种的便利条件，等到我们的结婚成功，便又大吹大擂地说：“这才真正是‘日满亲善’的模范呢”。不仅如此，在我们结婚后不多日，便由伪政府制定出一个《皇位继承法》来，在里面规定着：“皇帝死后的继承，应当由皇帝的子或孙；无子或孙时，可由皇帝的侄子继承……”侄子是指谁而言？不用说当然是指着“要由我及我的日本人妻子的混血结晶”而言，换句话说，就是仍想要抄袭着日寇对李垠——朝鲜的前国王——的老法子，想偷梁换柱地把将来他所扶植起来的“汉奸伪帝”进一步地成为“中日混血的伪帝”罢了。这种思想，是与下文所要讲的“神”的问题，是有着真正密切不可分的关系的。

#### 戊、“上层”的鼓动者

与上文相关联，凡是日寇想要开始鼓吹而又怕引起一般中国人对他们生出一种直接的反感时，便由吉冈做幕后的酝酿。就是：先抓住了伪“皇帝”，使他先作发起者，然后再由上而下一步一步的普及到一般人民中去。例如伪宫中的种麻及食粮的增产啦，捐金献银啦，低温生活啦，废除了自己的祖宗而把东洋的“神”做为自己的分支的祖先啦等等的“光荣的过去”，都是由吉冈所立案，所导演而出现于“上层空气”之间的。我认为他的这种犯罪行为，并不能把它局限为对于某一个人的愚弄和欺骗，实是对于全东北、全中国人民的犯罪行为。因为这种“上层的空气”，并不是局限在某一层范围内的关系，实在是“由上而下”的一直地使人民可以遭难受殃的直接原动力的原故。

“天照大神”的输入，固然是全东北把“天照大神”奉为公然的输入以前，早就有伪满的无耻、无民族气节的官僚中的腐败堕落分子们，曾经有每天早晨“斋戒沐浴”地去拜“神社”，或者甚至有把“神社”盖在个人的家中的丑事，但是，公然地把“神”奉为自己的祖先，并且亲自以“御驾亲征”的隆重行动，远远地“恭赴”日本，谒拜了“天照大神”的分体，并且特意地立了“祭祀府”，盖了非“特任”官不许进入“鸟居”——即“神社”前的形似木制牌坊的门——以内的“神”，订了逢年接节并及每周都要“大祭”、“小祭”多少次的祭典，跟着就是把“神”的信仰，迅速扩充到当时的全东北，不论机关、学校，男女老幼，都要每遇祭典就必须参加，每过“神社”就必须行礼等的侮辱民族全体的横暴无耻的罪行的“始作俑者”，则确是由于这位善耍傀儡的能手吉冈中将。

不但如此，如果光是侮辱的话，那倒还不能认为是大罪中

的一项罪恶，尤其是使人不能忍受的，是他不但要拿武力来强迫人们去接受，而且还要进一步的使忍受逐渐变成顺受，由顺受再演变为甘受，最后则是使中国的东北人民的子孙，都变成“神”的过继子孙而后已。这不能不说是吉冈的阴谋诡计是如何的深远及毒辣的了。

我认为这是与日寇的鸦片政策，是有着“同工异曲”的恶毒性的，这是想要在人民后代的爱国的民族热血中去泼冷水，想要把中国人子孙的民族意识加以绞杀的最可憎恨的大罪恶，像什么“八紘一宇”啦，“皇风洽六合”啦等无耻谰言，也都是从这个“神”字来出发的。

#### 庚、“亲邦”名词的制定

关于这一侮辱名词的出现，固然在最初我听说是由于日本的退役大佐、伪满的中将真井鹤吉——他曾任伪满的训练学校干事、伪治安部的次长等要职——所发明出来的，但是直接的公然的成为正式的名词，则是由于吉冈的扯动线索，变成“回銮诏书”——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带回“神体”后所下的“诏书”——中的“神圣名词”，最后是成为我们这一些伪军官吏及伪职员们的“必用熟语”了。固然也可以说，“这不过是侮辱那些甘为走狗的官吏的一椿事体罢了，谈不到什么侮辱当时全东北的人民大众的”，我认为不然！因为官吏们固然是常用它的，但是学校及多村的地方机关等也同样是使用它的，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侮辱当时人民整体的一个罪证！

#### 辛、跋扈与擅作威福

什么是威？威就是可以对于任何人都加以“反满抗日”、“思想不良”的罪名，轻的贬谪到穷乡僻壤去，重的便是被日本宪兵请了去，尝受那些帝国主义者的“得意杰作”的毒刑或虐杀。什么是福？福就是认为一个“忠诚不二”的日寇走狗，你

可以享受那些“加官进禄”的好处。什么是跋扈呢？跋扈就是抱着日本人的优越感，日本军人、关东军中将参谋、溥仪的“御用挂”的职位的优越感来干涉他的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情。我现在按照上述的顺序，引着实际事例来证明：

如对于宪原的将被任为禁卫队司令官事，他以禁卫队乃是保卫“皇宫”的部队为理由而不同意。又如伪宫内府的日本人的贪污事发后，只以表面上免官，实际上在锦州大开买卖而告完事……等等，这就是所谓的作威及作福；如在溥仪的妾死时，溥仪叫我帮忙办理丧事，而他表示反对。又如伪军部已经同意使我入伪大学——建国大学——去学习，也遭到他的反对，而极力使我考入日本的陆军大学等等的事，这都是他跋扈的地方。总而言之，他在伪满的这长久年代之间，所作所为的种种事迹，都是他横暴无羁的证明，真是难以一一举出来的，用“举一反三”这句话，就可以包括了说尽了一切。

### 壬：宪兵的头目

日本帝国主义暴力统治下的东北，可以说它是一个日寇对中国东北人民的十几年的大集中营，日寇的宪兵、警察、特务、走狗爪牙等的凶恶目光是透视着每一个角落的，就连伪宫中也是有一班换了特种制服的日本宪兵驻守着，凡是往来溥仪的中日人员，都得预先得到吉冈的谅解或许可，才能出入，被他许可随时可以去见的人，只限于我的家族及亲戚及特别许可的伪高级官吏——如张景惠等极少的几个人——而已。但是出入的时刻等，宪兵们也都作好了记载，每日向吉冈报告，因为他在关东军司令部里，并没有什么军事上的职务，只是拿着空筒子的中将参谋的头衔及“御用挂”的名义，来指挥着一小班的变装日本宪兵，所以我们都管他叫作“宪兵的头目”，他的职务固然只限于此，但是他的罪恶的波及和影响，却是可以称得

是“全满第一”，因为他是罪恶生长的温床及发源地。

癸、一直到了1945年的8月

他是由中佐的时候起，一直盘踞在伪官中升到了中将，他是在历任的溥仪的指导人员中，最长久最有势力、罪恶最大的一个。——第一任为上角利一，是由溥仪就伪执政的时候起，担任这项特别任务的，在任约一年余；第二任为中岛比多吉，在任约一年余；第三任为日本的退役少将，伪满的中将石丸志都磨，名义是“侍从武官”，在任约一二年；最后一任则为青冈，他是由1934年直到日寇的无条件投降为止的——他除了上述的各种罪恶的任务之外，还别出心裁地担任专向溥仪作宣传及教育的工作：把无线电中的日寇战胜消息随时的——不分昼夜随时皆可自由来见——作口头的报告；介绍日本的“神学大家”及对日本侵略有帮助的专门学者分期地向溥仪“进讲”——在这种时候，张景惠、熙洽等也均一同听讲——并把日寇的国策电影及战局的新闻影片等也放映给溥仪看。就在他的这种一手遮天的把持下，一直到了苏联红军的炮声一响，进军解放东北的时候，他还是不肯放下这块腐肉，还力排众议地把溥仪及他的家族等，都挟持到浑江附近的大栗子深山中去。最后日本裕仁在无线电里发表了投降之后，他还是不肯放松，非要溥仪丢弃了大部分的家族，到沈阳乘飞机逃往日本不可。就在“神体”由庄严的行列变成被拆卸的小零件而藏到桥本虎之助——日本的退役中将、伪祭祀府总裁——的行李中的时候，他还是以溥仪的“保护者”自居，竟敢要求苏军允许溥仪逃日，后来一直到被苏军擒送到通辽，才算是与溥仪脱离了关系，就直在飞机中，他看见我们都大吃苏联的罐头和面包时，还抱着蔑视的表情冷冷地说：“好吃吧！”，而作讥讽。总而善之由这个时候起，才算是完全脱离了把持着帝国主义的最后魔手。



#### 四、结论

我对于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代表者，是知道的最清楚和具体的。他的一举一动，无一不是本着日寇的大陆政策，由松到紧，由一部扩充到全般地一步一步来进行着的。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不知道曾经残害了多少中国人民的性命，往小里说，也害了我，差一点把我也同时扯到无底的黑暗继续的真泥沼里去。所谓的微笑和小恩小惠，我现在算是知道了，那不过是笑里的尖刀及包着毒药的馒头罢了，只要一上了他们的圈套，不是死就是虽然活着也没有脸去见人的被注定的结果在等候着，这就是我对于此事的一个结论。

#### 伪满协和会前两任中央事务局长

常 德

伪满协和会于1932年7月25日在伪都新京（长春）成立。首任中央事务局长是中野琥逸，二任局长是山口重次，两人分别为大雄峰会和满洲青年联盟的骨干。大雄峰会与满洲青年联盟都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几年，以满铁社员为核心，由在中国东北的日侨组成的反动团体。这两个团体的成员都因积极鼓吹日本侵占“满蒙”，建立“满蒙独立国”而受到日本统治当局的重视，被视为日本“在满”殖民者的“先驱”。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野和山口都与大雄峰会和满洲青年联盟的其他一些人一起，按照日本关东军的旨意，积极筹划与建立伪自治指导部，为日本侵略者控制与夺取县级